



社会工作名著译丛(二)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丛书主编: 徐永祥

丛书副主编: 何雪松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

◎ (英) Lena Dominelli / 著

◎ 王瑞鸿 张宇莲 李太斌 / 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务

◎ (英) Lena Dominelli / 著

◎ 王瑞鸿 张宇莲 李太斌 / 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英) Lena Dominelli 著;王瑞鸿,张宇莲,李太斌译.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1
(社会工作名著译丛(二)/徐永祥主编)
ISBN 978-7-5628-2103-8

I. 女… II. ①Lena…②王…③张…④李… III.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研究
IV. 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4726 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ISBN: 0 - 333 - 77154 - 0 by Lena Dominelli; published by PALGRAVE, Copyright ©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copy or transmis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No paragraph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save with written permission 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or under the terms of any licence permitting limi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T 4L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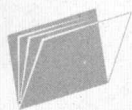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s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liable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ivil claims for damage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Copyright © 2007.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独家拥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04-711号”

丛 书 名	社会工作名著译丛(二)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丛 书 主 编	徐永祥
丛 书 副 主 编	何雪松
书 名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作 者	(英) Lena Dominelli 著 王瑞鸿 张宇莲 李太斌 译
出 版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邮 编	200237 电话(021)64250306
网 址	www.hdlgpress.com.cn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6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28-2103-8/C·118
定 价	35.00 元



社会工作名著译丛(二)
上海市重点图书

丛书主编/徐永祥

丛书副主编/何雪松



社会工作名著译丛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James Midgley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院长, 讲座教授 |
| Jim Barber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
| Marilyn Flynn | 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美国卫生部顾问 |
| Stanley Witkin | 美国维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社会工作系教授, 美国《社会工作》杂志原主编 |
| 王思斌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 |
| 邓伟志 |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
| 齐 铤 | 香港大学老年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卫生组织顾问 |
| 阮曾媛琪 |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主任, 教授 |
| 吴 铎 | 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
| 宋林飞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 陈丽云 | 香港大学行为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 |
| 杨罗观翠 | 香港特别行政区妇女委员,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座教授 |
| 郑杭生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
| 莫邦豪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 |
| 梁祖彬 |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主任, 教授 |
| 童 星 |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



丛/书/序/言

社会工作是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它既是一门科学和一种专业方法,又是一项有效的社会制度安排。其工作领域广泛涉及学校、医院、社区、司法部门以及各种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问题人群。其本质功能在于预防 and 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和维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提升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科学的助人方法,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事情。综观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当某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之时,亦即现代化的加速时期,必须面对和设法解决各种旧有的和新生的社会问题,必须创造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格局。为此,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不足以担当这些任务的,而必须同时发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非营利社会团体)的作用。这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即既要有一套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法律规范,又要在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上明确政府、非政府组织各自的角色以及两者合作互动的机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职业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的社会工作制度应运而生,作为非政府组织最重要载体的社会工作机构迅速发展;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形成了购买社会服务与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机制。战后的欧美国家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起飞的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也是如此。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有效地实现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分离,培育了一个初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相比之下,我国社会发育和发展的滞后情况却非常突出。尤其在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方面,“政社不分”、“以政代社”的体制性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单一的行政化倾向,使得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始终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政府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道义成本始终高企不下。即使是近年来蓬勃开展的社区建设,虽然在形态文明上成效显著,但在素质文明、社会文明和体制文明上却步履蹒跚。不仅如此,在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职能部分剥离以后,社区管理的单位化、行政化特征却愈发突



出了。深究这些现象,根本原因还是“政社不分”的制度性缺陷及其导致的社会发育不足,以及缺乏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应该看到,未来20年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起飞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要求将越来越高,社会发展的任务及其重要性亦将愈益突出。因此,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社会发展的体制性目标,营造政社职能分开的社会体制,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职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理当成为我国今后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一项紧迫性课题。

当然,推动我国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工作制度的发展,既需要向公众普及和宣传社会工作学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又需要以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视野加强社会学的研究和社会工作学的学科建设,致力于培养一大批通晓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专业人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众多海内外著名学者的热情支持下,组织翻译和出版了这套“社会工作名著译丛”。所选之书多为英美著名社会工作界教授的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著述。这些著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今西方社会工作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实践领域及实践模式。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香港大学社会福利博士何雪松的具体组织下,来自国内外多个社会工作系、社会学系和心理学的年轻教师以及博士生、硕士生加入了本丛书的翻译群体。作为我国社会工作学科薪火相传、走向成熟的年轻一代,他们以自己艰苦的学术工作,切实体现了社会工作高尚的价值理念!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自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和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教师撰写的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社会工作与管理丛书”出版以来,已被全国几十所高校选为本科生教材和研究生读物,更被众多地方政府、社区和专业机构选作指导其实际工作的参考读物。我们热切希望,这套“社会工作名著译丛”同样能够对他们有所助益!

近年来,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编辑出版社会工作类的书籍,为我国社会工作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他们的前瞻性眼光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本套译丛又荣幸地被列为上海市重点图书。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本译丛的工作计划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为此,如果国内外更多的同仁能够加入这项计划(原著作者和译者),我们将感到莫大的荣幸!

是为序。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丛书主编 徐永祥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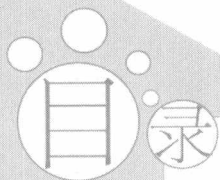
致/谢

写书从来就不是一项个人单独可以完成的工作。知识是通过人与人的互动产生出来的,即使一个独处书房的作者,他同样要依赖他人所获得、创造和传播的知识。相应地,如果没有读者的互动,写作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学术著作的写作却另有一套更加严格的规范,它影响到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并将他们放到了更为正式的要求之上,也就是学术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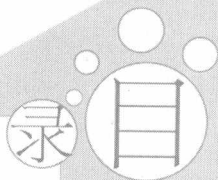
我想感谢许多无法具名的朋友,他们为本书的写作贡献颇多:那些同意接受我的访谈的人,那些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和我相互交流信息的学生,以及那些和我一起分享知识的同事。除此之外,我还要向以下各位表达我诚挚的谢意,他们为我的写作做出了特殊贡献。他们是:Marilyn Callahan,她读完草稿后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支持和回馈;我的父母,他们用无尽的爱与智慧陪伴着我的写作之旅;我的兄弟姐妹,当我感到迷茫时,他们的情感支持了我;还有 David 以及 Nicholas,他们用爱、智慧和同感包容了我的多次缺席。谢谢你们!正是因为你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本书的诞生!

Lena Dominel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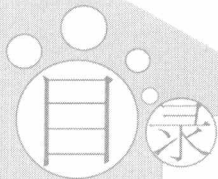
1999 年夏



致谢	1
导论	1
女性主义者直面平等社会关系的创造	3
女性主义理论和实务对男性和儿童的意义	5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6
重新定位社会工作	8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实务研究	12
本书结构	14
第一章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基础	16
导言	16
重新理解女性生活	18
不同观点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	21
重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34
结论	38
第二章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具体探讨	39
依赖：女性和社会工作者与国家关系的关键要素	40
全球化对福利状态的改变	43
照顾的混合经济及其私有化	45
赋权商业化	48
社会工作的非专业化	50
私有化以及集体福利关怀的个别化	51
对女性解放的抵制以及公共父权制	52
内外角色	53
后现代福利	54
结论	60
第三章 重新定义专业性	62
专业社会工作	64
女性主义对传统专业性的挑战	69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重新定义专业社会工作	73
假平等陷阱	75
结论	80
第四章 男性	81
性别政治情结	81
社会工作中的男性	82
男性运动	85
质疑男性特质	88
男性“案主”及同事	90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与男性	92
社会工作中的性别化社会关系	94
结论	100
第五章 儿童和家庭	102
父权制家庭	104
竞争的家庭	107
作为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儿童权利	109
女性的养育技巧是社会工作干预的主要焦点	110
父职是一种经济关系	114
作为父母的政府	115
父权通过“新”科技对女性生育能力的控制	116
结论	119
第六章 成年人	121
重新界定社区照顾的范围	121
制度性老年歧视和建立一个适合所有老年人的社会	122
重新界定照顾情境中的社区	125
转变专业界限和老年社会工作的非专业化	132
对照顾者进行照顾	133



老年虐待	137
结论	140
第七章 罪犯	142
缓刑：复健还是惩罚？	143
女性主义犯罪学者强化男性特质和犯罪之间的关联	146
女性罪犯	150
年轻犯法者的罪犯化	154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处遇罪犯	156
结论	158
第八章 结论	160
参考文献	164
索引	179
译后记	185



导 论

在被称为“后现代”的当今世界,女性主义似乎成了一个过时的词汇。西方的媒体自负地宣称女性主义已经过时,因为,我们现在已进入后女性主义时代。然而,对我这样的女性来说,这是个奇怪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女性所体验到的女性主义,一直充斥着贫困、日益严重的性暴力、越来越少的福利服务、日益受到失去生活和地位的威胁,我惊讶竟有这种说法,认为女性主义的诉求已得到实现,不再需要女性继续花费精力去奋斗。

特别是考虑到正在工业化或低收入的国家中女性的日常生活现实,这种立场更是显得荒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贫穷就像是地方病一样,致使很多儿童、女性和男性苦苦挣扎,试图维持食物、水和住所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UNDP, 1998)。在工业化国家,众多的社区失去了制造基地,随之失去的是本可以使年轻女性经济独立和自主的就业机会。提供给年轻男性的高薪酬的制造业技术岗位也消失了,这导致失去社会地位和生活目标的年轻男性走向犯罪道路并与社会隔离(Young, 1999),同时,也带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试图让这些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及在照顾儿童和老人方面共同承担责任。

如果女性不是在家庭和社区中从事大量的艰苦工作,她们的疏离感和苦难感会更巨大。通过无休止的工作,女性设法保持了身体和精神的融合,至少在彼时彼刻,在希望明天会更好的期待中,身体和精神保持了一致。女性梦想着到那时,也许她们和她们所爱的人会自由地享受他们所选择的生活。这个梦想至少在那些橱柜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喂养婴儿、皮夹里没有钱给奶奶买药的绝望的时刻,能让女性保持乐观。女性的这种决心要在凄苦的社会境况中活下来并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愿望,激发我去推动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以此为女性所期望的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这一目标贡献力量。但是,这个过程不能以一种朴素和宿命的方式来进行,而是要融入其他人的关注和参与。

照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可是,它也是一直被低



估并被视为一项理所当然的、女性天生该做的工作。然而,女性还是不断参与周而复始的照顾别人的过程中,她们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投入精力以确保所爱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些。女性所做的一切看似不需努力,有些社会工作者也这样认为,因此,人们往往看不到女性为了维持生存所付出的极大的心血(Callahan, 2000)。而且,社会工作者有一种倾向,认为女性是一个自治的孤岛,能自己在艰苦的社会沙漠中创造绿洲。在贫困社区中,每个人都受苦于不断加剧的贫穷,而传统社会工作的女性工作者很少关注造成女性贫困的社会结构原因。虽然女性社会工作者在女性努力奋斗及共同意识唤醒(这种共同性有助于跨越性别隔阂)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女性社会工作者也如同其男性同事一样,期望女性在最冥玩不化的性别歧视的社会环境中能掌控生活,而当女性做不到时,同样会严责她们。

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女性个人要对毁坏她们精心设计的生活计划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负责。这些专业人士在介入女性生活时,会毫不怜悯地将女性推入病态化过程,因此,很可能摧毁女性展示出来的脆弱的自我效能。所有这些都是鼓励独立、确信福利国家和他人慈善是靠不住的名义下发生的。女性应该被灌输的是“要举手奋斗,不要伸手施舍”,政治家如是告诉女性(Blair, 1999)。但是,没有资源的支撑,就像在不断扩大的裂口上放一根稻草当作桥一样,非常容易就断裂了,而留给毫无准备的女性的是更多的待处理的问题。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宗旨是处理这些议题,而处理的方式是将女性以及消灭结构上的性别不平等放在实务的中心位置。我将在本书中探讨这些原则。借此,我质疑将女性主义贬入历史冷宫的想法,并提出在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当今社会工作实务中,女性主义是很有意义的。今天的情况与我和 Eileen McLeod 写《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仍保有那时的一个特征——用乐观主义的态度来展望世界中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

大量的女性主义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女性主义的阵营中总是有着大量分歧的观点。因此,更合适的说法是,我个人对女性主义的解释和建构只是其中之一。我自己的观点是借用了大量的女性主义观点后的混合体。尽管女性主义是非连贯性的和多样化的,但除了那些一般分析和行动诉求外,仍有一些共享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整合生活中个人和政治的维度



(Millet, 1969);尊重女性的多样性(hooks, 2000);寻求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Collins, 1991);变革现存的社会秩序(Adamson 等, 1988),因为它难以满足男性、女性和孩子的不同需要。我用这些普遍性来探讨那些差异,那些被女性的声音所呼吁、被女性的活动所表达的差异。接着,我会考察社会工作者如何更有效地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务原则,这比他们运用正统的社会工作理论于“案主”工作中会更有效。^①虽然,我的写作主要基于英国社会背景,但女性主义透过自我反思的批判和延伸,超越社会排斥,实现社会多样化,因此,我希望我所探讨的问题也能得到其他地方女性的共鸣。

女性主义者直面平等社会关系的创造

女性主义者,作为力图从女性的视角来改善女性生活条件的女性们,一直在挑战压迫女性的不公正社会关系,这种压迫持续了很多个世纪,以各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国家(Basu, 1997)。在英国,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始自于20世纪60年代,女性呼吁结束压迫现代女性的社会不公(Banks, 1981; Tong, 1989)。在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中,女性主义聚焦于不同的议题,她们致力于确保对女性的公正,她们的努力唤起了这些地区女性的能量(Jayawardna, 1986; Basu, 1995)。

参与动员女性的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和结束这种压迫的方式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西方媒体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报道集中在美国白人中产女性群体,并认为女性运动的特征是单一化。其实,多样化一直是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属性。媒体的这种态度忽视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边缘群体,特别是生活在贫穷的劳工阶层中以及生活在少数民族社区内的女性(Dominelli, 1997a)。媒体的这种观点与颠覆女性主义普世性吁求的政治策略有关,其结果是没有认识到虽然不同族群的女性诉诸于不同的斗争策略,但她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共同的诉求(Basu, 1997)。

女性主义激进分子继续在她们关注的议题上努力着,不管媒体如何呈

^① 语言是深植于权力关系中的,这种权力关系在语言使用时是隐晦的。我将“案主”打上引号是要表明本质上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并质疑这种假设——那些以“案主”身份与社会工作者打交道的人是依赖的存在,她们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改造世界。我认为“案主”和社会工作者两者都是能影响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主体。



现她们的活动、她们不同族群间的差异以及她们在目标达成上的不平衡。通过不断反思,发出不同的声音,女性坚持在象征意义上和实务上强调她们是“多样性的统一体”(Collins, 1991)。老年女性提出了年龄歧视问题(Doress 和 Siegal, 1987);女同性恋者主张性取向的多样性(Forster 和 Hanscombe, 1982; Basu, 1997);残障女性要求关注她们跨群体的需要(Morris, 1991; Begum, 1993);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女性则坚持她们精神健康发展的权利(Bayess 和 Howell, 1981; Ashurst 和 Hall, 1989)。

女性运动的非连贯性意味着,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描绘没有性别压迫的社会愿景。有些声音表达的是,要确保女性的多样性不会被目标偏狭的女性社会行动所忽视。例如,黑人女性^①企图扩大分析的角度,坚持认为女性的受压迫经历是种族化的、性别化的和阶级化的(hooks, 1984, 2000)。她们一直在批评白人女性理论家将黑人女性从她们的分析中排除出去(Bryant 等, 1985; Bhavani, 1993)。她们的著作表达了经由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而遭受的压迫的特殊性(Maracle, 1996),并坚决呼吁不要陷入压迫的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以一种形式的压迫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压迫(Collins, 1991)。

对不同女性所持有的立场进行质疑的倾向一直根植于女性主义的承诺,也就是要自我反思、警觉和回应不同群体女性所认同的差异性需要(Collins, 1991; Dominelli, 1991)。质疑带给女性主义者诸多机会,使她们能够更好地获得其他女性的生活经验,加深她们的分析,意识到其他女性作为公共空间的合法占有者的存在,尊重那些表达了女性的经历和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不同声音。^②

与前期女性主义者相比,除了关注的事务不同之外,西方女性主义的

① 当提到不同群体的女性时,语言障碍就产生了。只辨识她们的独特性就模糊了共同性。很明显,术语如“黑人女性”或“白人女性”的提法是有问题的。但是,运用它们有一个优点,即可以指出虽然经历不同,但种族歧视影响了她们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哪个类别是同质的或是由彼此相似的女性组成,人口的异质性在讨论身份问题时是很重要的。当我提到身份的特定属性时,我会用其他的词。

② 叙述者的声音也是有问题的。我既是广义女性运动的一部分,也是运动中的一个女性个体。我用第三人称复数的这种远距离的叙述手法来表明,虽然我的经验和观点中的一些元素与其他女性相同,但我并不能认定她们是谁,因而也放弃了用“我们”。我选择这么做是表明我特定的立场,不以过度的包容性来使用其他声音。



“第二次浪潮”争取解放的道路也不相同,她们坚持“个人的即是政治的”(Millet, 1969)。对她们而言,权力关系存在于日常的私人领域或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中,就如同发生在公共领域中一样。她们也信奉理论和实践的整合,这个立场试图消灭将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截然分开的做法(Brandwein, 1991)。对此,她们坚持认为,目标和为实现目标所进行的活动过程有直接的联系(Cook 和 Kirk, 1983)。女性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会预存于今天她们所置身的关系之中(Dominelli, 1991b),而且,女性主义者并不只是想能与男人平起平坐,她们还渴望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Basu, 1997)。这个渴望是基于一种信念,那就是人类幸福应该是社会议程的核心。虽然赋予这些希望以实质内容的理念的形成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女性主义对世界的新愿景包含了以下重要观点:彼此平等的关系、相互的依赖性、代际间的团结,以及创造一个定位于满足而不是压迫人们需要的经济系统(Dominelli, 1991, 1997c)。简而言之,传统的做法不再是适宜的,它的持续再生产也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女性主义理论和实务对男性和儿童的意义

女性主义者一直高度关注社会关系在公共和私人的所有领域都具有的性别特质。她们的分析揭示出男人在很多社会领域都享有特权,这种特权是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的,包括将女性排除在有薪工作之外,而男性则占据高薪工作(Armstrong, 1984; Coyle, 1989)。女性主义研究也揭示出男性运用情感的、身体的、性的暴力对女性进行社会控制(Rush, 1980; Dworkin, 1981)。虽然男人们会说如果女性愿意,她们也可以进入男人主导的公共领域,一些女性主义者也要求男人在家里做很多传统上是女人做的家务(Segal, 1983),如家务活、养育儿童、照顾老人(Walby, 1990)。但是,其他女性主义者已经发现,将男性包括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是有问题的,因而,她们坚持女性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与男性并肩工作(Solanas, 1971; Jo, 1981; Frye, 1983)。

这样,女性主义对现实社会地位批判的一个实质内容就是,呼吁终结男性特权,因为,这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可悲的是,对这个立场的实现已经引发了希望保留特权的保守男性的恐惧(Brooks, 1996)。他们不仅不欢



迎一个可能丰富他们自己生命的事业,而且,短视地固守着一个被神话了的过去,在那里,他们被赋予不可争辩的权威(Bly, 1985)。并且,他们将致力于反对女性主义,以推翻女性主义所赢得的成果。他们认为,女性主义将有损他们的势力空间(Lyndon, 1992; Farrell, 1994)。

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若要真正自由,男性须从强加给他们自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桎梏来自他们对父权制社会关系的坚持(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 Collins, 1991)。此外,这些女性主义者还将儿童和男性包括进来作为她们社会行动的受益者。就儿童而言,这意味着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儿童作为个体有自己不可让渡的一系列权利(Clinton, 1996; Dominelli, 1999)。一些女性主义者已经在尝试寻找一些方式,既能满足女性的利益,同时,又不会有悖于儿童的权利(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其他女性主义者则发现这很困难,还在继续挣扎在调和女性生活中的矛盾(Wise, 1985)这个问题上。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发现了国家利用专业女性照顾工作者来控制其他女性(Wilson, 1977),这当然被看做是不可接受的(Marchant 和 Wearing, 1986; 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虽然女性主义的诉求获得实现的前景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但女性主义者一直在努力使所有的人都不受压迫,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并不是寻求推翻一种压迫——即男人对女人的压迫,然后用另一种压迫代替它,即女人压迫男人,甚或是一群女人主导其他女人。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发端于女性主义的社会行动,这是通过社区中女性和女性共同工作而实现的(Dominelli 和 McLeod, 1989)。其目的是通过将女性的个人苦难和无法与人诉说的私人悲哀与她们的社会位置和地位联结起来,以此改进女性的福祉。这意味着私人困难被重新定义为公共问题。虽然其他社会工作者坚称是社会造成了个人的问题,如,Attlee(1920),但是,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首次将女性困扰的根源定义为女性的社会位置和角色。在创立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中,女性激进分子借鉴了女性主义的一般观点,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这样就与女性主义运动达成了互动的关系,为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做出了贡献。